

全国人大代表、天能集团董事长张天任建议：

将铅蓄电池纳入“工业固体废物资源综合利用产品目录”

□ 本报记者 王薛滔

“铅蓄电池全生命周期的绿色管理,是‘无废城市’建设的重要工作内容。随着各项政策的落实,铅蓄电池全生命周期绿色管理的薄弱点已经不是制造和使用环节,而是回收和再生利用环节。”今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天能集团董事长张天任在谈及高质量建设“无废城市”问题时说道。

为了进一步促进中国铅蓄电池产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支持高质量建设“无废城市”,助推生态文明建设。张天任在今年两会带来的《关于统筹调整优化铅蓄电池产业财税政策 高质量建设“无废城市”的建议》中提出,建议将铅蓄电池纳入到正在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编制的“工业固体废物资源综合利用产品目录”。

铅蓄电池全生命周期绿色化管理成效显著

据统计,每年我国退役的铅蓄电池约为500万吨,而这些废旧电池中含铅含酸物质可以循环利用。处理得当,则变废为宝,能有效减少铅矿开采和进口,保障国家资源战略安全;处置不当,含铅含酸的物质就会进入土壤、空气和水,污染环境,对人们的健康也会



造成威胁。所以说,铅蓄电池的全生命周期绿色化管理,是“无废城市”建设的工作抓手,也是成败关键。

目前,铅蓄电池的全生命周期绿色化管理,包括生产制造的清洁化、使用消费的绿色化、回收网络的体系化、再生处置的循环化。近年来,大型骨干铅蓄电池企业围绕产品的全生命周期深入开推进“四化”工作,在积极参与和配合国家“无废城市”建设战略的同时,持续不断的推进企业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

张天任表示,“十二五”以来,大型骨干铅蓄电池企业的清洁生产和污染防治能力取得了显著进步,有些企业的绿色发展水平甚至走到了全球同行业的前列,已经成为清洁、环

保、资源循环性的绿色新型能源产业,近年来主动履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在国家产业政策的支持下,加快构建电池回收体系,积极参与“无废城市”建设,为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and 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回收和再生利用成薄弱环节

张天任调研发现,在“无废城市”建设过程中,铅蓄电池企业主要存在以下突出问题:在回收环节,“正规军”干不过“游击队”;在冶炼环节,正规企业“吃不饱”,成本高。

以回收为例,废铅蓄电池属于危险废物,按照《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规定,回收企业的资质要求严,仓储建设标准高,跨省转运审批多,规范收集难度大。比如跨省转运手续,即便各项审批程序顺利,也需要3个月左右的时间;运输所必须采用的危化品物流专用车,价格是普通物流车的两倍以上,使用率极低,增加了企业成本;而“低小散”的小商小贩,走街串巷违规收购,简单破碎后,将较难回收的电解液(主要是硫酸和铅泥)直接倒入土壤或排水系统,将铅板出售给无资质的小作坊、小冶炼厂,形成了“正规军”干不过“游击队”的乱象。

统一政策避免“劣币驱逐良币”

张天任表示,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减税降费的力度,支持实体经济,鼓励绿色发展,让企业切实感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温暖。但从铅蓄电池全生命周期的产业链来看,财税政策的精准性还需要进一步提升。

张天任建议,将铅蓄电池纳入正在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编制的“工业固体废物资源综合利用产品目录”,并按照“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的整体要求,对符合国家和地方环保标准、依法开展综合利用的铅蓄电池,免征环境保护税。

同时他指出,在国家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中要求,各地要因地制宜,重点识别主要固体废物,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方案。但由于各个省市的主要固体废物不尽相同,铅蓄电池使用范围广,每个省市都要一定的废弃电池产生。因此,张天任建议国家相关部门要统一协调,明确将铅蓄电池纳入到各省市的主要固体废物识别名单,同时由国家相关部门出台统一政策,完善措施,指导各地出台废弃铅蓄电池在收集、转移、利用、处置等的行政规范。

全国人大代表、自贡市轻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研究院副院长符宇航建议：

丰富盐品种 提升盐品质 打造盐品牌

□ 本报记者 张丽娜

老百姓日常消费中不可或缺的盐,关系到食品安全和民生等一系列的问题,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盐业改革也是近两年的热点话题。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自贡市轻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研究院副院长符宇航对本报记者表示,盐业改革对盐企的影响是利好的,也是盐企所期待的。

“盐业体制改革之前,处于最下游的制盐企业最辛苦,但获利最少,利润分配严重失衡。改革调动了盐企的积极性,促使盐企自身开始拓展下游销售渠道,研发新产品的热情也空前高涨。”

另外,符宇航说,盐业改革让盐企可以直接对接消费端,避开了中间商的高价差。

但是,她认为,改革初期,盐企可能会为了争夺消费者而进行粗放的低价竞争。因此,企业一方面要开拓市场渠道,另一方面要根据消费者需求实现产品多样化、打造品牌。“用价格去赢得消费者是一个错误的观念。”符宇航说,“另外,打破区域之间的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的桎梏也尤为重要。应该把选择权交给消费者,而不应人为地设置障碍。”

符宇航说,为了满足差异化的消费需求,盐企应积极实施“三品”战略,即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

在品质方面,现在,盐业企业正在通过改进工艺,从原盐纯度和形貌、辅料配料等方面逐步提升食盐品质。

在食盐品种方面,符宇航表示,现在缺乏对品种盐名称的统一规范,今后应制定相应标准。

“有数据显示,日本市场流通4000多个盐品种,但在我国,食盐品种远远少于这个数字。各个企业盐品种的名称比如高纯盐、精纯盐等,听起来不一样,但实际上指的都是纯度高的盐。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和规范,也很难直接统计,会存在重复统计的情况。”符宇航说,“统一名称规范也是下一步需要做的工作。可以先划分几个大类,比如,纯度达到99.5%以上或者更高都可以叫高纯盐,然后在这个大的类别下再来命名自己的产品名称。又比如调味盐,又可以分为餐桌盐、炒盐等。餐桌盐下面又可以根据用餐方式细分,比如,有些盐适合直接凉拌,有些盐适合烧烤时撒在食物表面,有的盐粒较粗,有的较细……根据消费者需求和用餐场景进一步细化,这是食盐品种细分工作下一步的方向。”

符宇航认为:“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也可以适量发展出口盐。另外,盐改后,中国盐业协会也可以发挥更多功能,和市场监管部门一起,引导盐企根据消费品安全生产要求开展生产。品种盐产品开发方面,除了根据消费者需求细分,也可结合盐企生产地的特色,比如结合当地生产的特色食品或者新食品原料,开发差异化的有自己特色的品种盐,避免雷同。而不是一个企业做出一个新产品,大家都跟风。”

品牌方面,符宇航说,目前还没有叫得响,让人眼前一亮、像全球知名品



牌莫顿那样的食盐品牌。“说到酱油,消费者很容易想到海天和李锦记,但我国食盐品牌对于很多人都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符宇航说,盐改之后,盐企也需要时间去打造品牌。“过去搞专营,盐企把盐生产出来,交给盐业公

司就行了,没有动力去打造品牌。所以,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不是一蹴而就的,但一定要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在谈到“健康中国”时,符宇航说,“健康中国”不仅要保证贫困地区能够吃的上盐,还要推动减盐行动计划。“现在有些盐企会在产品包装中配备限盐勺,方便消费者控制每天食盐的摄入量。同时,现在物流发达,要鼓励盐企到不产盐的偏远贫困地区去销售。”

总之,盐企最终应以满足消费者需求为目标实施“三品”战略,打造特色盐品种,提升盐质,食盐生产方式亦应由工业粗放型朝食品消费型方向转变,实现安全生产。

符宇航还表示,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她希望听取更多盐行业的呼声,并乐意对盐行业发展提出更好的意见建议,为盐行业代言。

(上接A1版)

习近平强调,要加快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公共卫生法律法规体系,健全权责明确、程序规范、执行有力的疫情防控执法机制,普及公共卫生安全和疫情防控相关法律法规,提高

全民知法、懂法、守法、护法、用法意识和公共卫生风险防控意识。

习近平指出,新时代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要坚持预防为主,创新方式方法,推进城乡环境整治,完善公共卫生设施,大力开展健康知识普及,倡导文明健康、绿色

环保的生活方式,把全生命周期管理理念贯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各环节,加快建设适应城镇化快速发展、城市人口密集集中特点的公共卫生体系,深入持久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现在,出门佩戴口罩、垃圾分类投放、保

持社交距离、推广分餐公筷、看病网上预约等,正在悄然成为良好社会风尚。这些健康文明的做法要推广开来、坚持下去。

丁薛祥、孙春兰、黄坤明、张春贤、郝明金、何立峰等参加审议。

(上接A1版)

习近平指出,到2020年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是我们党对人民、对历史的郑重承诺。目前,全国还有52个贫困县未摘帽、2707个贫困村未出列、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未全部脱贫。虽然同过去相比总量不大,但都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是最难啃的硬骨头。我们要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带来的不利影响,付出更加艰辛的努力,坚决夺取脱贫攻坚全面胜利。

习近平强调,做好“六稳”工作、落实

“六保”任务至关重要。“六保”是我们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重要保证。要全面强化稳就业举措,强化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帮扶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做到粮食生产稳字当头、煤电油气安全稳定供应,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障基层公共服务。同时,要在“稳”和“保”的基础上积极进取。

习近平指出,对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农业基础地位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和削弱,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如此严重,但我国社会始终保

持稳定,粮食和重要农副产品稳定供给功不可没。总的来说,我国农业连年丰收,粮食储备充裕,完全有能力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新形势下,要着力解决农业发展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重点从农产品结构、抗风险能力、农业现代化水平上发力。要保障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生产供给,强化“米袋子”省长负责制考核,加强粮食市场价格监测和监管,加快推动“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落实落地。要稳住猪肉等农副产品价格,落实生猪生产省负总责要求,持续抓好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做好

“菜篮子”产品稳产保供。

习近平强调,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国之大者要心中有数,强化责任担当,不折不扣抓好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落实。要加强协同配合,增强政策举措的灵活性、协调性、配套性,努力取得最大政策效应。要转变工作作风,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客观规律,把更多力量和资源向基层下沉,在务实功、求实效上下功夫,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丁薛祥、刘鹤、张庆黎、李斌、何立峰、高云龙等参加联组会。

□ 本报记者 林墨涵

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多蒙德实业集团董事长石磊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资金和人才成为当下民营企业持续发展的关键。

人才是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资源,当前民营企业人才匮乏已然成为公论,无论是资源型企业,还是生产加工企业都面临着人才匮乏的困扰和无奈。煤化工、冶炼等基础性工业因为其工作环境较差、远离市区等原因,人才更难以引进,一些民营企业的大学生占比不到2%,民营企业科研能力不强,领军人才匮乏,特别是技术型和管理型高端人才匮乏成为制约民营企业转型发展的瓶颈,着力解决民营企业人才问题迫在眉睫。

石磊委员建议,政府应该重视企业高端人才队伍建设,鼓励大专院校毕业生到民企就业,助力民营企业不断完善人才队伍建设。设立民营企业人才建设专项基金,加大对民营企业人才的奖励力度,对民营企业高层级专业技术人才、新引进的急需紧缺专业技术人才,给予相应补贴。针对民营企业科研能力不强,领军人才匮乏的现状,政府应加快民营企业人才孵化基地建设,引导规模以上民营企业建立专家工作站,并给一定的启动资金。

在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上石磊委员表示,长期以来受多方面因素影响,融资难一直是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的最大瓶颈。

近两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的政策文件,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缺少实施细则,导致政策落地难。另外民企之间的联贷联保业务,在经济运行平稳时期,为民营企业解决融资难题做出了积极贡献,但在经济波动或下行期,联贷联保业务形成的担保圈风险也逐渐暴露,一旦其中一家企业出现风险就会引发连锁反应,影响其他正常生产经营的企业,一损俱损。

石磊委员建议,切实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及时化解担保圈风险,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应切实履行好主体和监督责任,进一步完善尽职免责、容错纠错机制,激发服务民营企业的内生动力。充分发挥金融科技作用,实现数据共享,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近年来,随着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商业银行推出较多的小微信贷,云信贷产品,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小微企业融资问题。但是贷款额度相对较低,不能满足企业信贷需求。建议商业银行依靠金融科技手段,及时获取纳税额,针对企业规模,区别对待,提高贷款额度。同时建议政府有关部门牵头负责,将企业纳税数据、征信数据、工商数据、司法数据等通过平台整合,实现与金融机构数据共享,商业银行依靠各项数据,通过金融科技手段对企业进行精准画像,全面了解企业经营情况,给予民营企业更大额度的信贷贷款支持。切实落实差别化货币信贷支持及定向降准政策。在实施差别化货币信贷支持政策或定向降准时,应倾向于对民营企业与小微企业贷款占比大的金融机构。



全国政协委员、中投公司原董事长屠光绍建议：

将两轮共享出行工具纳入国家应急资源调配体系



□ 本报记者 李豪悦

共享单车在国内的快速发展,使其在疫情期间的作用凸显了出来。为此,全国政协委员、中投公司原董事长屠光绍在今年两会建议:将两轮共享出行工具纳入国家应急资源调配体系。

共享单车社会功能凸显

相关数据显示,疫情爆发初期,武汉各家医院方圆百米以内的单车骑行量占比快速提升了5个百分点,同期城内超市、农贸市场周边的骑行量占比也显著提升。当城市公共交通停摆,民众对原本只起到辅助角色的共享单车等两轮出行工具的刚开始被唤醒。

值得一提的是,部分共享出行企业反应,企业需要经过相关主管部门多层审批才可进行车辆调配。这导致疫情期间,企业很难做到更科学且更有效率地提供服务。

纳入国家应急资源调配体系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中投公司原董事长屠光绍,在今年两会,提出将两轮共享出行工具纳入国家应急资源调配体系的建议。

针对疫情下共享单车的使用,屠光绍在建议中提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规定,目前的应急预案,并没有将共享单车等两轮共享出行工具纳入其中。他认为,在疫情期间,共享单车作用凸显,将共享单车两轮出行工具纳入应急出行管理体系统一调

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多蒙德实业集团董事长石磊建议：

切实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和人才培养问题

配,有利于将有限的资源更有效率地调配,也让“紧急状态”下两轮共享出行工具的管理变得有章可循。同时,共享单车属于公司,相比私人征用更加便捷、有效,也便于后期返还等处置,并补充应该订立紧急状态下,将共享单车纳入应急管理体系的相关办法,为具体操作提供制度基础。

健全应急物资储备保障制度

面对疫情期间,共享单车的使用缺乏统一指导和规划的问题,屠光绍也在建议中谈到,应建立健全应急两轮共享出行物资储备保障制度。他表示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规定,各地政府将两轮共享出行工具纳入应急出行管理体系后,应该按照“统一调度、集中使用”的原则,将政府储备和社会储备能力相结合,构建以政府应急资源为主,社会应急资源为辅,管理科学、运行高效的应急出行管理体系系统,探索建立资源共享和使用效益最大化的应急工作和储备保障机制。同时,在常态时期,政府应提前与共享出行企业签订协议,充分保障应急两轮共享出行物资的生产和供应。

大数据助力精准防控 完善奖惩机制

随着近些年,越来越多企业依靠后台大数据实施精准管理,今年疫情期间,不少企业与政府通过数据对接来实现精准防控。据了解,哈啰与成都、台州等地疾控主管部门联动,将骑行数据后台对接城市健康码系统,从而实现共享单车数据洞察优势与疫情精准防控结合。

为此,屠光绍在建议中提到,要打通“紧急状态”流程,将共享出行大数据与疫情精准防控结合。哈啰等企业的成功实践应进一步扩大和推广,通过政府和企业共管共治来探索更科学和有效的防疫措施。

最后,根据《交通运输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规定》,屠光绍建议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引导、协助共享出行企业开展运维人员应急培训,完善奖惩机制,根据应急表现给予企业相应奖惩。